

·民族传统体育·

本土文化对中华民族体育的历时性阻力

——以中华武术为例

陈青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在中华大地上孕育的中华民族体育, 不仅受到本土文化的推动, 同时也受到其制约, 特别是由于传统思想、文士崛起和战争形式变化三大要素的影响, 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体育渐失“武化”属性, 渐入“文化”行列, 最终中华民族体育没有能够成为竞争含量浓厚的体育, 然它独具特色。因此认为应在现阶段避免“言武必技击, 谈体必竞争”的价值取向, 正视历史, 遵循规律, 变阻力为动力。

关 键 词: 中华民族体育; 本土文化; 体育文化; 历时性阻力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4-0092-04

Diachronic resistance of local cultures to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by taking Chinese Wushu for example

CHEN 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ports gestated on the land of China are not only promoted by local cultures, but also restricted by local cultures. Especially, due to the effect of such three major factors as traditional ideology, rise of intellectuals and change of war form, national sports represented by Wushu have gradually lost their “martial” attribute, and got on the “cultural” track. Although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did not become very competitive sports ultimately, they hav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avoi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lways thinking about boxing when talking about Wushu or competition when talking about sports”, face up to the history, follow the pattern, and turn resistance into power.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sport; local culture; sport culture; diachronic resistance

本土文化历时性积淀为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在这种力量的背后, 自然存在着遏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向现代体育方向发展的因素。这种蕴含于历史过程中的力量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体育发展的历时性阻力。其作用随着时代的不同影响和作用力大小不一, 或强或弱地对中华民族体育产生制约。阻力与动力相对立, 左右着前进的速度和程度。

李力研^[1]对此分析颇为透彻:“中国文化有人本主义内容, 否则就不会提出‘仁’的概念来。所谓‘仁’就是‘关心人’的意思。然而, 这种人本主义态度还

主要是‘伦理主义’并非真正的‘人的主体性’。孔夫子等虽然高唱过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可损害等爱惜身体的话, 但并没有因此而高度重视体育锻炼。孔子与所有儒家学说一样, 提倡的都是‘修身’和‘养性’。‘修身’里含有一定的锻炼内容, 但绝对不是体育锻炼, 而是如何更让肉体听从灵魂的摆布。因此, 口口声声有一些人本色彩, 但骨子里并没有对肉体的高度重视。这一点与希腊完全不同。中国是越来越重视精神和道德……据顾颉刚考证, 中国古代的‘士’原本都是‘武士’, 后来才分化出‘文士’来。文武分

收稿日期: 2007-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民族体育跨文化研究》(05BTY025)。

作者简介: 陈青(1963-), 男,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民族体育文化与体育社会学。

途，必然趋势，但文武平衡，各有千秋才对。在中国则越来越成了文士的天下，武士成了某种象征和摆设，事实上从来都不重要（除了特殊时期如战争）。重文轻武从汉代以来就是大格局。”

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中华民族体育会产生什么变化，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武术为例进行分析。先秦时期武术技法相对来说是比较质朴的，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个体的武术技法演练。“伐，谓击刺也，一击一刺谓一伐。”在平时的训练中，讲求集体性，周武王告诫士兵们：“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阵战中集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保持阵法的整齐十分关键，简单、有效的击刺动作是赢得战斗的保证，军事训练中的武术技法主要是体现其实用技击性。尚武成为社会时尚，“齐人隆技击”（《荀子·议兵》），“齐愍以技击强”（《汉书·刑法志》），武勇之士在齐国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被给与高官厚禄，终日斗拳较武，甚为横行，在这种氛围中技击术被推崇备至。与此同时，民间的武术技击表演也十分活跃，技法也相当丰富，而且是名人辈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一段民间剑术家宝贵史料。越王勾践想练兵强国，问兵于相国范蠡，范蠡介绍了一位民间的女剑术家。“越王乃使聘之，问以剑之术。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2]84}没有深入的武术技击和表演实践，越女不会谈出如此形象、精辟的技击表演理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剑术套路水平在技击性基础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表演技巧，这些技巧不仅是为了表演之用，更是训练作战能力的战术思想。这种技击还有很强的竞技性，可以当场比试，“其验即见”。

春秋战国前后战事频繁，崇武尚力大行其道，《小雅·巧言》一诗中讥讽无能小人是“无拳无勇，职为乱阶”，社会阶层也相应地发生特化，该阶段出现了“士”阶层，其中“武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构成。西周、春秋时期，士的组成已很复杂，其主要部分是武士。到了战国，依然如此。武士是相对于文士而讲的，其中又分为几种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泛称为“士”、“士卒”、“武士”、“兵士”、“军士”、“农战之士”、“三军之士”、“列阵之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3]。军队之中的武士自然不用多说，这是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比较重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侠”这个阶层，它的出现和存在决然是应时代的需要，主流思想鼓励

的结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此阶层存在的社会根源是入世建功、诚信恩义、追求公正、英雄崇拜、墨家意识等因素的使然^[4]。

斗转星移，汉唐以降，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太平盛世的时段不断延长，文明程度日趋增强，士的阶层悄然变化，辉煌一时的武士开始走向衰落，发生了转化，他们向着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渗透，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职责。与他们相生相伴、非常密切的中华武术也随之产生变异，演变为以套路为主、非竞争的民族体育形式，以此供人们娱乐、健身。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的若干影响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历时性阻力，遏制了中华民族体育竞争性，中华武术技击性的进一步强化。

第一，人本至上的中国传统思想。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烈，可以从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中管窥端倪。在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中，道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思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迺后可也。”（《太平经》）思想的广泛流传下，《老子想尔注》甚至将《老子五千文》中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处一”，改为“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城中有四，而生处一”，并在“注”中说：“生，道之别体也。”^{[2]205}由此，人和社会的需求发生相应改变，中华民族体育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异，价值取向出现转移，表现为阴弱长胜、示弱斗智，引发了注重长生，提倡养生，强调修身的社会价值倾向。中华民族体育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形式出现顺自然、重养生、尊道法、尚伦理、崇悠戏、轻竞技之态势。养生之风越演越烈，两晋时期的葛洪，穷毕生精力，创建一套具“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功效的“金丹道教”；宋代道士蒲处贵推行“小劳术”，世人践行的“八段锦”等养生术乃民众健身首选内容，可见中华大地养生之习不息，健身之术日新，养生意识渗透在中华民族体育的各个层面，自然左右着民间百姓习武动机。

第二，柔弱胜刚强的文士阶层。随着文士的崛起，武士的社会功能和社会需求逐渐缩减，以武勇谋生的武士阶层生存空间日趋萎缩，文士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文士更多在催化思想文化的发展，贯彻完善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改革进步，构建古代科技体系等方面对社会的优势作用得以凸显，故而备受统治集团的重视。社会进程中，大体经历了从体能竞争向智能竞争两个主要阶段，其间包含着种种相互融合、变异的竞争形势。当智能竞争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竞争手段时，

为文士的活跃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广泛的空间。不容否认,社会智能的发展与从事智能活动的人群数量存在正比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的文明大国,与重视文士的智能有直接关系。至此,武士还能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空间可想而知。倍受器重的文士生活方式自然成为引领社会时尚的榜样,而文士青睐的体育活动多局限于文静的内容,如围棋、象棋、投壶、雅戏之类。而且,这些活动被文士们提升到为政、崇礼、守德的高度,其中围棋则被赋予“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的寓意(《宋史·潘慎修传》)^[6]。无形中强化了文士社会地位和静态体育形式,进而加剧了文弱之风的兴盛,遏制了中华民族体育的竞技性演变进程,中华武术技击性也进一步失去了有限的社会生存空间。

第三,日益摒弃武技的军事战争方式。人类社会建立以来,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类,从刀光剑影到硝烟弥漫,战争的方式不断发生着变化,引发战争方式根本变革的是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军事史学家普遍认为,公元10世纪初火药逐步应用于军事,并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记载了3种冠以火药名称、用于实战武器的火药配方。1161年,宋、金的采石之战中,出现了利用火药喷射力的霹雳炮^[6],火器逐步配置到军队装备之中。战争武器的日益革新也使原本依托体能和技能的战争变得更加依赖于兵器的先进程度,以及兵法的合理运用。脱胎于军事战争、个体私斗等搏杀术的中华武术失去了“建功立业”的阵地,只有披着文明的外衣以竞技表演形式步入民间。适应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更是中华武术发展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武术的技术体系、技术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曾记:“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生动地记述了当时表演的盛况,其中就有武术表演。“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六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不仅有两人对练,而且有多人的对练。“烟中有七人,着轻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执真刀,互相格杀击刺,作被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这种执真刀互相格斗,惊险逼真^[7]。随后的中华武术套路更多地掺杂了“花拳绣腿”的成分,这些内容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观赏需要,依然能够为战争做准备,发挥着“便勤手足”的功效,毕竟冷兵器时代没有完结。不过,自宋以来的武术套路迅猛发展,不再以军事战争为动力,反以民众愉悦之需为基准已成定局。至明朝武术套路已经种类繁多,

风格迥然,非技击性的娱乐观赏表现力大大加强。

上述3个主要影响因素,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但对于民族体育而言它已然演变为一种历时性的阻力,严重妨碍着中华民族体育各种形态的竞争特质的发育和发展。中华武术技术在先秦时代简约、实用的对抗技击技术与魏晋之后富含表演、娱乐、健身性的套路技术形成鲜明对照。

通过中华武术技术体系的变异轨迹,可以归纳出中华民族体育起源与社会各层面息息相关,其发展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交织更为广泛而深入,且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定型主要取决于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上述3个制约因素中对中华民族体育影响至深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其中儒、释、道等思想致使中华民族体育被深深地打上了本土文化烙印。这三种思想均极力倡导和塑造国人成为理想人格的“仁人志士”。儒家以“仁”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核心思想,从人的“仁之本”血缘心理基础向外层层辐射,不断强化的理性人间秩序为价值体系指导人们的言行;佛学以“空”督促人们“无心于万物”、“即物顺通”,使心灵得到宁静;道家以统摄天道、世道和人道之“道”来规劝人们“致虚极,守静笃”,明事理,以退让、克制、示弱、柔软的方式保持平和的心境。它们相互融合形成强大的文化涡旋力,共同作用于国民,作用于中华民族体育。当起初蕴含在宿体中的元素在剥离过程中和形成自身体系后,它们不断地完善着自身的特质,其特质不仅包含一定的宿体基因,同时更多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受思想意识的制约,表现出时代的、本土的风貌。魏晋以来,由于争强好胜的体育与培养理想人格南辕北辙,竞争、技击内容逐步被世人轻视、摒弃,各种民族体育多以娱乐为立足之本,逐步脱离了原生的生产、军事等具体实用特征。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大行其道的项目如摔跤、龙舟、风筝、射箭、秋千、捶丸、毽子、棋类、冰嬉、舞龙、舞狮等均以娱乐为主体,且从摔跤等项目至舞狮项目,大体呈现出竞争含量和强度逐渐递减的趋势,人们难以发现其直接的生产 and 军事要素,更多地是次生态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从仿真到隐喻,从实用到伦理,从严肃到随意的转化趋向,这是一条与西方体育不尽相同的运行轨迹。当中国社会环境演进更加注重智能、注重人性、注重修身时,具有“野性”的民族体育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统“文化”洗礼,没有一项能够逃脱传统文化这张大网。“武化”虽显疾风暴雨,强劲有力,影响力毕竟是暂短的、阶段性的。大凡统治阶级利用武力取得政权之后,多数转向文而治之,推崇智能,使文化产生持久的社会功效。“武化”只有在社会动荡时才被人们

想起，“武化”的内容在和平时代被文化强烈地侵蚀，文武交融，以文抑武渐成东方民族体育的文化背景。概括地说，在中华民族体育发展和定型过程中，无断裂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强大的本土“中和”、“尚文”的文化惯性，严重缺失的“武化”意识，活力日渐衰微的封建社会，持续、强烈、深远、综合的影响，中华民族体育失去了保持武化的良好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中华民族体育的“直白”、“完全”竞争机制发展产生了重大抑制和阻碍，最终中华武术不可能表现出原生的技击性，中华民族体育也没有发展成现代形式的体育。

对于今后中华武术的发展来说，我们认为，不能以技击性为中华武术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应该看到中华武术的表演、健身、娱乐的结构和功能由来已久，随文化背景、文化使命历时性变迁，它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竞技艺术文化。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也绝不能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唯一的参照系，要看到中华民族体育特色与其生存土壤息息相关，是与西方体育文化截然不同的民族体育体系，东方人体文化以人本之上、身心兼修见长。这得益于本土文化的历时性阻力，在某种程度上它保持了本土文化特色，是维护本土文化底线的最基本的文化力量。应将阻力变为中华民族

体育特色发展的动力。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和体育界应克服“言武必技击，谈体必竞争”单向度的价值取向影响，走主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 [1] 李力研.解读体育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1.
- [2]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84，205.
- [3]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4] 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205.
- [6] 倪乐雄.战争与文化传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67.
- [7]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197.

[编辑：李寿荣]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中小学体育的曙光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自2002年试行以来，各地认真组织推广试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在认真总结试行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对《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给学校体育发展带来了曙光。

注重继承与创新。继承《劳卫制》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成功经验，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学生体质状况的实际，在《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基础上增加了锻炼效果好、实效性强、简便易行的锻炼项目和少数运动技能项目，目的在于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对各学段、各年级学生项目的设置有了明确的规定，教师可基于基本项目，结合本校情况，延伸教学内容，开发和利用体育课程资源。

管理系统网络化，达到资源共享最大化。《标准》在数据上报与管理制度的方面更趋完善。一是上报工作制度化，数据上报时间固定在每年9月至12月；二是实现上报工作便捷化，上报测试数据的工具软件可网上免费下载，由互联网

向各地和学校提供信息检索、统计、分析等服务，可以有效发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的作用，有利于及时、科学综合地评价全国各地、各学校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状况，对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状况进行监控和反馈，为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位一体，形成合力。结合“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创新工作方法，使广大学生动起来，在参加阳光体育运动和“达标争优”的锻炼中不断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学生的《标准》测试成绩按评定等级记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小学列入学生成长记录或学生素质报告书，初中以上学校列入学生档案(含电子档案)，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从而强化了过程学习和管理。此外，《标准》测试器材必须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并得到监管部门认定。

(谢卓锋 广西桂林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桂林实验中学)

体育在线论坛相关链接：<http://www.tiyuol.com/thread-5352-1-1.html>